

語
文
學
習

55

2

YUWEN XUEXI

语文学习 丛刊

上海师范大学《语文学习》丛刊编辑组

2

YUWEN XUEXI

上海教育出版社

语文学习丛刊(2)

上海师范大学

《语文学习》丛刊编辑组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嘉路12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日历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5 字数 95,000

1978年1月第1版 1978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7150·1801 定价: 0.28元

目 录

语文教学的指路明灯

- 读延安《〈文化课本〉序》……………游 森 (1)
- 语文训练问题需要加紧研究……………张志公 (5)
- 一点补充意见……………吕叔湘 (16)
- 从几篇古文教材看“四人帮”
- 对语文教学的干扰和破坏……………胡格非 (18)

正确领会《青年团的任务》(节选)的中心论点

- ……………金竞秋 王载元 (24)
- 总理为人民,人民爱总理
- 读柯岩同志《周总理,你在哪里?》
- ……………南京市第十中学 龚秀娟 (29)

略谈鲁迅小说中“我”的形象……………柳尚彭 (33)

读《论雷峰塔的倒掉》……………谢象贤 (42)

让孩子们在春天的阳光下活泼成长

- 读鲁迅的《风筝》……………王法仙 (46)
- 从鲁迅手稿中学习修辞……………毛惜珍 (51)
- “出于自然,又加人工”……………王尔龄 (58)

陆游诗词选讲……………朱碧莲 (61)

辛弃疾的两首北固亭词……………杭州大学 吴熊和 (74)

赧郎明月夜 石工巧如神

——读两首写工人劳动的唐诗……………霜 竹 (80)

历史唯物主义, 还是历史唯心主义?

——评《红楼梦》研究中两种主题论、价值观的

根本对立和“四人帮”的反党“红学”……………郭豫适 (84)

巴金和他的《家》……………邵伯周 (93)

要想讲好课, 必先备好课……………浙江金华二中 李 元 (101)

“命题”小议……………辽原中学 金怡弟 (105)

谈看图作文……………闸北区教师红专学院 方仁工 (109)

让学生学会改作文……………劳动中学 包雍然 (112)

把消灭错别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

……………曹杨二中 王敏如 (114)

谈词语的并列……………文 铨 (118)

关于歇后语……………夏光芬 (122)

谈谈错别字……………朱 川 (126)

漫谈“散文”……………王光祖 (131)

语文教材《临江楼记》修改质疑〔读者来信〕…………… (138)

问题解答

…………… (140)



语文教学的指路明灯

——读延安《〈文化课本〉序》

瀚 森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总是以极大的热忱关注着如何迅速地提高我国劳动人民及其子女的文化程度，造就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毛主席、党中央的直接关怀，适用于提高广大工农干部文化水平的教材——延安《文化课本》编成出版，毛主席亲自为之作序，给以高度的评价，指出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这不仅是对一本具有较高水平的文化教材的热情赞扬，而且为我们进行语文教学改革、编好语文教材指明了方向。

毛主席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万丈高楼，没有牢固的基础是无法盖成的；同样，要做好工作，要学好理论，就需要有扎实的语文基础。这是因为，一个人的亲身实践必然是有限的，只有整个人类的伟大实践，包括前人和他人的经验，才是无比丰富的。无论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或是

科学实验中积累起来的经验，都要通过语文这个工具，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交流和推广。我们学好语文，正是为了熟练地掌握这个工具，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早在一九三六年红军大学初创时期，毛主席就把识字、作文、看书报能力的培养，作为整个教育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指出，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着的基础工具了。毛主席并且着重地指示红军大学，定期检查时文化应是重要的检查标准之一。遵照毛主席的这一教导，中学语文教学的任务，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学生学习课文和必要的语文知识，进行严格的读写训练，使学生在思想上受到教育，在读写能力上得到提高，能够正确熟练地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在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是很激烈的。“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推行了“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极其反动的愚民政策。他们胡说什么“知识愈多愈反动”，把文科毕业不知道汉高祖就是刘邦的“大学生”捧为批判“智育第一”的“标兵”；把交白卷的政治骗子张铁生封为“反潮流”的“英雄”。流毒所及，语文学科的教学质量大受影响，中学生阅读和写作的基本能力的培养受到干扰破坏，后果极为严重。因此，我们一定要把全面、认真地落实毛主席关于语文教学的要求，当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建国二十八年来，在毛主席教育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语文学科的教学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批判了刘少奇“基本照旧”的错误主张，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同时，又批判了“全盘苏化”的错误主张，总结了

我国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特别是老解放区的先进经验，总结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创造的新鲜经验，语文教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对于如何通过课文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如何通过字、词、句、篇，对学生切实有效地进行阅读和写作的基本训练；如何进行启发式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何课内外结合，通过多种途径，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广大语文教学工作者，为之贡献了自己的辛勤劳动。当然，语文教学改革的任务是艰巨的，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和解决。

要搞好语文教学，就要有一套好的语文教材。当年，对于延安《文化课本》的出版，毛主席表示了热烈的欢迎，称之为是一大胜利，并且指出，课本内容，还须随时改正缺点，推陈出新，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毛主席这一指示，十分正确地阐明了语文教材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为如何建设一套好的教材，指明了方向，至今仍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建国以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教育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语文教材编写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四人帮”及其余党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采用极其卑劣的手法，肆意阉割马列、毛主席著作，歪曲和糟蹋鲁迅的著作，全盘否定我国数千年的灿烂文化。他们抛出反动的“空白论”，一笔勾销了巴黎公社以来反映国际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作品，全面排斥我国“五四”以来的优秀作品。他们出于“改朝换代”的反革命需要，对于周总理、朱委员长和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气壮山河的革命作品，一概摒弃，而把他们自己的那

些内容极端反动、语言佶屈聱牙的毒草文章塞进教材，大肆宣扬。“四人帮”及其余党还破坏语文教学的科学性、知识性和系统性，破坏培养阅读与写作能力的循序渐进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大肆贩卖“帮八股”，窒息马克思主义的文风。他们的倒行逆施，严重干扰、破坏了上海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严重影响了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

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要在二十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迫切需要培养和造就大批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材。这就要从教育入手，要真正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党和领袖对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关怀是多么的亲切，对我们的期望又是多么的殷切啊！粉碎了“四人帮”，全国各条战线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大干快上，一个万马奔腾的跃进局面，正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出现，教育战线也是生机勃勃，万象更新。今天，我们重读《延安〈文化课本〉序》，重温毛主席的亲切教诲，更加信心百倍，更加热爱我们为之服务终身的语文教学工作。毛主席的教导，象光芒万丈的指路明灯，照耀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坚信，在毛主席教育思想的指引下，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和关怀下，经过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一步肃清“两个估计”的恶劣影响，一定能全面而正确地总结建国二十八年来语文教学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编写出一套思想性与科学性统一的、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适应四个现代化需要的语文新教材；一定能群策群力，高度发挥我们语文教学工作者的聪明才智，把我国语文教学的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语文训练问题需要加紧研究

张 志 公

这里要谈的是语文训练，不是语文教学。各级学校的语文教学有几方面的任务，语文训练只是其中之一：语文训练也并不仅仅通过学校的语文课来进行，此外还有别的途径。

语言、文字是很重要的工具——是人们交流思想、组织集体生活、组织共同的生产劳动的工具，也是进行社会斗争的有力武器。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基于这种根本的性质，语言、文字还是学习和教育的工具。掌握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是高是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关系到学习和教育的效率和效果。

每个人从幼儿时候起，可以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学会说话，识字之后可以自然而然地学会读书、写文章，乍看起来，语文训练仿佛很容易，没有什么值得研究之处。其实，不然。尽管话是人人会说的，读和写是识字的人都会的，然而有学得快慢、精粗、优劣之分。学语言，学文字，都有规律可寻。弄清楚这些规律，有意识地、恰当地运用于语文训练，可以大大提高训练的效率，一是可以更快，二是可以更好；否则，反是。很需要把语文训练作为一项科学问题加以研究。

近年来，语文训练工作和语文训练研究工作，也象文化、科学、教育领域其他各项工作一样，受到“四人帮”严重的干扰和破坏。语文训练中有些方面，过去摸索出一些经验，没有很

好地总结；有些方面的做法还停留在相当陈旧的水平上；有些方面还根本缺少办法。这种情况，与发展教育、科学，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关于语文训练问题的研究是迫切的，需要加紧做起来。

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之一是识字问题。

汉字，当前实际使用的究竟有多少个；其中最基本、最常用的有多少个，是哪些，这些字在语言中的活动情况如何；比较常用的，不常用的，很少用的，分别有多少个，是哪些，它们在语言中的活动情况如何；需要进行科学的统计和分析。以前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不全面，不精确。现在有更科学的方法，有新的设备（如电子仪器），为进行这种统计、分析提供了更好的条件。统计、分析的结果，将为识字训练的安排、设计提出有力的根据，使识字训练带有较多的科学性、计划性，减少一些盲目性，从而大大提高其效率。

汉字有它的特点。从识字训练的角度看，有不利的方面，也有某些有利的因素。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实事求是。不能不承认学汉字有它的难处，也不应当夸大它的难处，无视它的易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要一个一个地学，一个一个地记，虽然经过简化，数量仍旧不少，笔画仍旧相当复杂，认、记、写都有难处，这对识字训练是不利的。然而，汉字的表意作用，尽管现在已有限度，毕竟还有可以利用之处。象形、会意的痕迹，有一部分仍有助于学习；不少偏旁对于认识、理解、记忆整个的字仍有一定的帮助。汉字，基本上是每一个字代表一个单音节的语素，非常容易构成对偶、排比之类的组合，构成整齐押韵的短语和句子，这个特点是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其他

语言、文字无法比拟的，对于识字训练大有用处，传统的识字训练曾经有意识地（虽然不够科学地）利用这个特点。汉语的构词法有它的规律，经过选择的一定数量的字，能够构成大批有用的词，这个特点也是很突出的。对于这些有利因素，我们有笼统的认识，但是从识字训练的角度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很不够。如果经过研究，能够把有利的因素充分加以运用，把不利方面的影响尽量缩小，那对提高识字训练的效率必将大有作用。

小学教育阶段的识字训练和成人扫盲的识字训练，很不相同，应当分别针对其特点，研究最有效的途径和方法。

成人扫盲的识字训练，目的任务单纯，可以更充分地运用汉字的特点，集中、快速地进行。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识字训练方法颇有可参考处，值得很好地加以研究。我们应该有批判地吸取其合理的部分，运用我们新的科学研究成果，予以改造和发展，使之适应我们的需要。

小学教育阶段，问题比较复杂。学龄儿童进入小学，不是单纯来识字的，虽然对于一个儿童来说，开始识字是他在发育、成长过程中的一件大事。进小学，为的是接受有计划的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识字，是为了掌握工具，是为进行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服务的；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又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识字训练的成果。这里存在着如何处理好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问题。学龄儿童的口头语言能力，思维能力，接受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的要求，都已达到相当的水平，然而他们还是“文盲”，才开始识字，而学习汉字的难处，又主要集中在开始的阶段。这中间存在着矛盾。在这对矛盾之中，儿童的智力发展和学习要求是主要方面。只能想方设法

解决识字问题，来适应智力发展和学习要求的需要，决不应压住智力发展和学习要求，去迁就识字不足的困难。处理好这种关系，解决好这种矛盾，在小学教育阶段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处理、解决得是好是差，关系到整个小学教育的进度和成效。这个问题值得花大力量搞一些科学研究和试验。

初学阶段的识字训练问题，我们已经摸索了上千年了。封建社会有一套以“三、百、千”“上大人、孔乙己”为代表的做法，其后是“人手足刀尺”的做法，又其后是“大狗叫，小狗跳”的做法；新中国建立后，有了很大的发展改变，开始“开学了”的做法。这种种不同的做法包含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值得好好地分析、批判，研究、总结。

这里试为概括，大体上似曾走过这样三种路子。入学之始先集中一段时间突击识字，只求识，不要求所识的字都能讲、能写、能用；在这个阶段中以识字为主，同时不受识字进度的约束，另外进行一种写字训练：结合识字相机进行有限的一点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这样搞一段时间（比如半年、一年），认识相当一批字（比如一千至二千）之后，转而开展阅读，以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为主，结合着巩固和扩充识字。这是一路。一上来就以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为主，在初识之无的基础上就大量阅读，阅读中接触的字，只要求理解、记忆一小部分，大部分“囫圇吞枣”地念过去，懂多少算多少，基本上是听其自然地逐渐积累。这是另一路。把识字训练和思想教育、知识教育基本上拉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两方面的进度都放慢一些，但都要求“掌握”，基本上不容许“囫圇吞枣”，凡认识的字，都同时要求能读、能讲、能写，并且记住，随着识字量的增长，相应地逐步扩充阅读的内容、范围和数量。这是又一路。这

三种路子分别是以怎么一些理论为依据的?实际的效果如何?各有那些利、弊?专就方法而论,是否存在取长补短,形成一种新的、比它们都更科学、更全面、效果更好、效率更高的做法的可能性?

现在,我们有了一套汉语拼音字母,并且已经一定程度地推广、普及了。在这个新情况下,应当研究怎样充分运用这个工具为识字训练服务。如果经过研究、试验,探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将使识字训练以至整个小学教育在进度和效率上发生相当大的变化。有这样一种设想:学龄儿童入学之始,用很短的一段时间学会拼音字母,此后,即以拼音字母为工具,开展有计划的语言训练和完全适应他们的智力发展和学习要求的、内容丰富多采的阅读训练,改变以往初学阶段的读物由于受到汉字牵制而远远落后于儿童智力、要求的状态,也改变以往初学阶段把精力全部灌注在很难对付的汉字上以致忽视了十分重要的语言训练的状态;在适当的时候,在语言训练和阅读训练中,逐步有计划地引进汉字,从少到多,从简易到繁难,阅读材料从以拼音字母为主、汉字为辅,逐步到以汉字为主、拼音字母为辅,再到全用汉字、拼音字母退而为纯粹的注音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完全按照汉字本身的特点和规律,与阅读训练平行地但是分别地进行识字训练;认识了一定数量的汉字之后,有计划地、按照汉字结构特点进行写字训练。这种设想的基本思路是:借助拼音字母开展语言训练和阅读训练,识汉字,写汉字,这三者各自按照本身的要求去进行,不互相干扰,不互相牵制,三途分进,逐步靠拢,终于达到胜利会师,完全结合在一起。估计:采取这样的办法,用四年时间,可以从从容容地完成以往六年的工作,或者用稍多一点

的时间达到比以往小学毕业生高得多的水平。当然，这还只是一种设想，有待研究，有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比如，推广普通话问题等等）有待解决，特别是有待实地试验。

无论是小学阶段还是中学阶段，语文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实际上都与语文训练有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语文训练为其他各门学科服务，其他学科又对语文训练产生很大的推动和协助作用。同一个时间内进行的各方面的教育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各自孤立、互不相干的。相互间的这种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不论你有没有意识到。变无意识的互相影响为有意识的互相配合，效果显然会更好。怎样配合，是值得作为一个重要题目来研究研究的。以往，编语文教材的不管别科教材是什么模样，编别科教材的不大理会语文教材是怎么编的，各搞各的，互不相谋；教育工作者亦然，你教你的，我教我的，小而言之你用你的简化字，我用我的繁体字，你说你的普通话，我用我的方言，你用你的拼音字母，我用我的直音，你搞你的语法、标点、书法，我认为那是无关宏旨的小节。这种“严格分工”、“各自为战”的状态，很需要打破一下。

另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是逻辑、语法、修辞训练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培养阅读、写作能力的效率和效果。逻辑、语法、修辞训练搞得好，颇有助于提高培养阅读、写作能力的效率，培养得更快些、更好些；搞得差，至少是徒然耗费一些时间、精力，虽有若无，不起什么作用。

在我国，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逻辑、语法、修辞的概念是古已有之的。属于逻辑、语法、修辞性质的专题研究，以及在语文训练中综合地运用这些研究的成果，有很久的历史。虽然有些做法并不是很自觉的，而且从不打出逻辑、语法、修辞这

一类的旗号，不大讲这一类的理论知识。传统做法中有不少封建糟粕。里边也有某些合理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土生土长的，富有民族色彩，符合汉语、汉文的特点，经过长期实践，因而是行之有效的。对传统的做法仔细考察，具体分析，批判其错误的、陈腐落后的部分，参考其合理的、有用的部分，既不全盘接受，也不一股脑儿抛弃，这样对改进、提高逻辑、语法、修辞训练的方法、效率，会有一定的帮助。

十九世纪末，在维新运动“学西方”的浪潮中搬来了西方的逻辑学、语法学，其后又搬来了人家的修辞学，并且相继把这些运用于语文训练。几十年中间，做法上有过一些变化。旧日的师范学校和部分高级中学曾经开设过逻辑课、语法课和修辞课；其后又多半取消了这些课，而把语法、修辞容纳在“国文”课里，容纳的办法又有所不同，逻辑则多半不怎么理会了。新中国建立后，语法受到重视，语文课里一直或多或少地教些语法知识，也教点修辞知识，还有一度专设了汉语课，其中教了不少语法知识和一些修辞知识；逻辑，则只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附在语文课里教一点，没有专设过逻辑课，逻辑主要在大学哲学系里作为一门专业课教学。几十年搞下来，从语文训练的角度看，是否有些成效呢？有，但是不大。这个问题，值得花些力量好好总结一下。有了哪些成效？这些成效是怎样产生的？成效为什么不大？这几门“学”的本身存在什么问题？在语文训练中运用这些“学”的方法存在什么问题？如果能够把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准确地总结出来，那对于研究今后怎样改进，将是大有益处的。

从语文训练的角度看，并且是从对我们本国的学习者进行汉语文的训练这个角度看，逻辑、语法、修辞这三者的重

要性是等同的呢，还是有所不同？如果有所不同，何者最重要？何者比较重要？就汉语而论，字词、语句、篇章的运用中，是涉及逻辑的问题比较多些，还是涉及语法的问题比较多些？在汉语、汉文的运用中，修辞与逻辑、修辞与语法分别有哪些关系？

理论联系实际，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就语文训练中的逻辑、语法、修辞训练而论，这个原则应当怎样体现？哪些基础的理论知识是必要的？这些知识应当怎样教，怎样学，怎样联系实际？哪些理论知识在语文训练中是并不必要的，只要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安排的作业就能熟练掌握的？在这个问题上，以往有过哪些经验教训？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做法和现代科学在哪些方面存在着互相配合、综合运用的可能性？

逻辑、语法、修辞，作为三门不同的“学”，是完全应该分别进行研究的，它们分属于不同的科学研究领域，当然在分别研究时也应注意到彼此的关系。但是，从语文训练的需要着眼，它们是应当作为三门“学”来对待、处理呢，还是应当充分结合起来，综合地加以运用？它们结合得起来吗？答案应当是肯定的。逻辑研究思维形式的规律，语法研究思维的物质材料——语言的规律，修辞研究语言运用和加工的手段，它们是近邻科目。问题只是怎样结合法，怎样结合得好。以上这些问题都值得大力进行研究。

语文训练不单是课堂里的事，也不单是学校里的事。每个有文化的、能读能写的成年人如果仔细查看一下自己的语文能力，他将发现，他认识的字，掌握的词、成语、谚语等等，能够熟练运用的表达形式，相当不小的一部分不是从语文课中、